

Deng Xiaoping Lilun Qing-shaonian Duben

邓小平理论青少年读本

3

JIANSHE YOU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ZHENGZHI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



上海



邓小平理论青少年读本

3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林尚立

上海教育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青少年读本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林 尚 立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93,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00 本

ISBN 7-5320-6144-2/G·6299 定价:5.20 元

目 录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1
——邓小平理论的民主政治思想	
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	2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	10
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18
民主政治建设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26
二、依法治国	32
——邓小平理论的法制建设思想	
现代化建设需要法制	33
依法治国是党的治国方略	39
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立法与执法	46
法制建设必须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52
三、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58
——邓小平理论的军队建设思想	
军队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59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67
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73
中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80

四、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87
——邓小平理论的党的建设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88
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96
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103
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活力	109
五、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17
——邓小平理论的祖国统一思想	
祖国统一是全民族共同愿望	118
用“一国两制”统一国家	127
“一国两制”以社会主义为国家主体	134
统一祖国归根到底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	141
六、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	149
——邓小平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150
以和平共处为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57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63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170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的民主政治思想

1957年初，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到清华大学，给大学生作了一次生动的形势任务报告，在报告中，他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其中就包括大学生们关心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他指出：总的趋势是我们要逐步发展和扩大民主，否则要犯错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的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在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的高度。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国内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两条重大政策的形成，既是出于对“文

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同时也是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为此,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不是抽象和绝对的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列宁曾这样赞誉民主,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从人类第一次用民主这个词表示“大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形式开始,不知有多少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追求民主、实践民主和完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为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仅建立了以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为本质特征的“新型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为民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宪法保障和制度基础。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我国的民主发展经历过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把健全民主的政治生活看作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条件,为此,他把政

政治上发展民主置于和经济上进行改革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民主从来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邓小平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在强调政治上要发展民主的同时,也一再强调政治上发展的民主不能是抽象的和绝对的民主,要明确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切忌抽象地空谈民主。那么,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邓小平回答说:“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而且因为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离开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前途。

民主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决定了任何民主都是有条件、有前提的。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决定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人民奋斗的根本,它已载入宪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

义,发展民主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二条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对分子专政的有机结合,因而,对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且,人民民主专政所包含的对敌对分子专政的那一面,对社会主义民主还起到了重要保证作用。

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三条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离开了共产党领导,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失去了领导力量,国家也将四分五裂。邓小平认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

四项基本原则的第四条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指

导思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相反,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不但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发展,而且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会被葬送。邓小平说:“如果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

发展民主要切合实际

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美国的民主制度似乎已成为一种“经典”模式,美国政府极力宣传和输出这种民主模式,同时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和政治家仿效美国的民主。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始终没有把这种“经典”模式作为自己的样板。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分析了中国民主和美国民主,并告诉美国客人,中国发展民主不会搬用美国的模式。他说:“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套。

不能照搬照套的另一面，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这方面，邓小平强调了民主发展要切合实际，即“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所谓“根据自己的特点”，就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条件出发，通过发扬长处，克服短处，弥补不足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7年，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以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发展为例说明香港回归后的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时，把这方面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他说：“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为此，邓小平始终认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在邓小平看来，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单纯是改革我们制度和体制的弊

端与不足，它同时还应包括如何保持和发扬我们制度和体制的优势和长处。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保持和发扬现行制度和体制的优势与长处，不仅使社会主义民主有更为坚实的发展基础，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87年，邓小平在与南斯拉夫朋友交流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就认为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而且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分析指出，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西方国家那么多的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认为，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总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保持了这个优势和优越性，我们的现代化发展就有更可靠的制度保障。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发展民主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展民主不仅要考虑到民主本身的要求，同时要考虑社会全面发展对发展民主的要求。基于中国改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提出的现实要求,邓小平认为,在当今的中国,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因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才有希望。

那么,在中国目前的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下,调动积极性的最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邓小平解释道:调动积极性的最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让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性,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在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中,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总目标之一。

邓小平认为,把调动积极性作为中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目标,一方面是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政治和社会生活所提出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调动积极性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所在,是保证改革开放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对此作了分析:“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

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因此，当时邓小平认为，应该把农村的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但是应该看到，下放权力毕竟仅仅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手段，它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邓小平认为，要能从根本上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使其转化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必须作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首先，在经济上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调动积极性是相辅相成的，调动积极性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而发展生产力是调动积极性的保证。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才有稳固的现实基础。所以，邓小平说，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在政治上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其核心就是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相结合，实现各种政治利益、经济利

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邓小平认为,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这就是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为此,邓小平向全党提出要求:我们要努力实现这样的政治局面。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

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这是一位以提问尖锐、言词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而著称的记者。在这次后来被邓小平称为“考试”的采访中,法拉奇提出了这样一个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对此,邓小平回答道:“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

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过程中，制度改革是关键。

制度与人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两方面因素，任何政治现象的形成都与这两方面因素有关。就制度与人两者的基本关系来说，制度更具决定性意义，因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社会活动的，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在存在弊端和缺陷的制度下，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难免不犯错误。所以，他得出结论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在邓小平看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只有进行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教训已表明，我们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他意味深长

地说道：“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所以，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改革，推到了改革的前沿。198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全面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因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

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回答了这个问题：“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显然，政治体制改